

“伞式社会”

——观察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新概念

张继焦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为什么中国可以快速发展起来。由此，我们思考了几个相关的问题：中国经济崛起与巨大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有什么关系？政府与企业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尽管中国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是市场或市场主体充当“运动员”和取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充当“裁判员”的角色。但是，通过对“地方”和“企业”两类案例分析，我们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崛起的推动力和发展方式之一是：尽管发生了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转型，但是，在属地经济和“官本位”体制下，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的关系依然是原有的“庇护”与“被庇护”伞式关系。在中国各地经济的发展中，在大大小小的各种庇护伞状结构下，当地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伞式社会”特点。

关键词：伞式社会；伞式关系；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资源配置

一、问题的提出

最近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其中，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此，我们提出几个相关的基本问题：中国经济崛起与大规模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有什么关系？政府与企业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二、理论准备和分析框架

（一）理论准备与研究范式

第一，关于中国市场转型的主要观点和争论。

在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发生变革之前，支配西方社会科学界对东方社会主义的研究思路主要

有两种研究范式——极权主义范式^①和现代化范式^②。然而，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和前苏联、东欧转型的现实，这两种范式显然都没有足够的解释力。1989年，倪志伟（Victor Nee）在《美国社会学评论》（10月号）上发表的“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过渡”^③一文，提出了著名的“市场转型理论”。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新制度主义范式^④。此后，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者对中国市场转型进行了一些有影响的探讨。譬如，戴慕珍（Jean Oi）提出了“地方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理论^⑤，魏昂德（Andrew

作者简介：张继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社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北京，650221）。

① Andrew G. Walder 在《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一书中认为，极权社会有两个非常特殊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涉及政党与其支持者之间纽带的性质。在作为资本主义另一极的极权主义看来，政党与支持者之间是一种事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性的，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关系。即使在革命成功以后，意识形态取向仍是社会动员的基本手段。第二个特征可以称为社会的原子化。这种社会不强调区别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凡是直接妨碍执政目标实现的社会纽带均消失了。“原子化大众”的存在，不仅为维持权力所必须，而且可以确保毫无障碍地对群众进行总体性动员。参见 [美] Andrew G. Walder 《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② 对于现代化范式，主要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一旦政权得到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就必然致力于经济发展。这种增长要求实现现代化和引进现代技术，而工业化和现代科学技术又要求有一套相应的现代价值观和制度，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结构的变迁。现代化的过程将以自己的必然逻辑使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对自己进行重建。

③ Victor Nee,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4, 1989.

④ 此研究范式弥补了极权主义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种旧范式忽视制度的缺陷，同时又要与凡伯伦和康芒斯等人在20世纪早期倡导的制度主义区别开来，所以被统称为“新制度主义范式”。

⑤ 她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具有公司的许多特征，官员们完全像一个董事会成员那样行动，这种政府与经济结合的新制度形式，我称之为地方法团主义……我所说的地方法团主义是指一个地方政府协调其辖区内各经济事业单位，似乎是一个从事多种经营的实业公司”。参阅 Oi, Jean,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1, 1992; "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China Quarterly*, Dec., vol. 144, "Special Issue: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1995, pp. 1132~1149; "The Evolution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Andrew Walder (eds.), *Zouping in Transition, The Process of Reform in Rural North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Jean C. Oi, (eds.),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G. Walder) 形成了“政府即厂商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的理论、^① 林南 (Nan Lin) 提出了“地方市场社会主义 (Local Market Socialism)”理论^②等。在中国学界, 洪银兴和曹勇对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的作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③ 杨瑞龙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在转型期的特殊功能和角色。^④ 张继焦探讨了经济文化类型从“原生态型”到“市场型”的转变。^⑤

第二, 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及其转型的研究。

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时, 于 1948 年提出了“差序格局”理论。^⑥ 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可以简称为“差序格局”社会。这一理论也是中国内外学者探讨中国社会结构的经典理论。笔者曾经在 10 年前, 试图将“差序格局”理论从“农村版”发展为“城市版”。^⑦

与费孝通类似, 日本人类学家中根千枝 1967 年发表的《纵式社会中的人们关系》,^⑧ 是一本用新颖独特的方法研究日本社会结构的著作, 是风靡一时的畅销书。日本社会可以简称为“纵式社会”。在当时, “纵式社会”理论不但成为人们广泛谈论的话题, 而且成为研究者对本国社会进行重新分析的一面镜子, 激发起日本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情。

第三, 如何看待中国的市场转型与社会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自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市场转型与社会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 李培林先生早在 22 年之前, 于 1992 年就提出了“社会结构转型”理论, 或称“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理论。李培林认为, 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期, 即从农业社会、乡村社

会、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工业社会、城镇社会和开放社会转型。社会结构具有相当大的空间和变动弹性。人们的风俗习惯、行为方式、道德伦理、价值观念, 以及社会上的利益格局和运行机制等在发生结构性变动时, 会形成一种巨大的、潜在的力量。在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转型时期, 影响中国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力量, 除了一只有形之手——国家干预和一只无形之手——市场调节之外, 还存在着第三只手, 那就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这“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不仅推动着社会发展, 而且会从深层次上影响着资源配置的实际方式、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⑨ 这一理论命题的意义在于: 跳出了在西方十分盛行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解释模式的束缚, 建立起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以说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成长的过程。这一理论对中国社会科学界有很多影响。^⑩

(二) 研究假设和分析框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高到“决定性”的高度, 充分显示出今后主要由市场或市场主体充当“运动员”, 政府则主要充当“裁判员”的角色, 从而厘清了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边界。^⑪ 这是中国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但是,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仍然是: 在所有制结构上, 以公有制 (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 为主体, 外资、私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种属地经济体制中, 中国各级政府的“官本位”不仅作为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主导者, 而且在现行垂直任命制的管理体制中得到强

①他对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研究源于对科尔奈的研究的反思和深化。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类似于一个工厂或公司内部的结构关系, 即政府作为所有者, 类似于一个公司中的董事长, 而企业的管理者则类似于厂长或车间主任的角色。参阅 Walder, Andrew,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o 2, 1995, pp 268~269.

②“地方”指的是当地的社会文化基础 (社会网络是其轴心), “市场”指的是经济系统的变化 (市场机制是其核心), “社会主义”意指不远的过去所留下的政治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为其核心)。参阅 Lin, Nan, “Local Market Socialism: Local Corporatism in Action in Rural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4, no 3, 1995.

③洪银兴, 曹勇:《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地方政府功能》,《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

④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⑤张继焦:《经济文化类型:从“原生态型”到“市场型”——对中国少数民族城市移民的新探讨》,《思想战线》2010年第1期。

⑥“差序格局”理论的要义是:人们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参阅费孝通《乡土中国》初版本,上海:上海观察社,1948年。

⑦张继焦:《差序格局:从“乡村版”到“城市版”——以迁移者的城市就业为例》,《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⑧中根千枝认为,日本社会的特征是纵向式的人际关系,就是一种居于一定的场所、以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上下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参阅 [日]中根千枝《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陈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⑨李培林关于“社会结构转型理论”的基本命题主要体现在被称为“社会结构转型三论”的3篇论文里:《“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再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对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⑩臧得顺:《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与实证对一个师承性学派研究成果的谱系考察》,《思想战线》2011年第4期。

⑪《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2013年11月12日全文发布。

化。^①

在属地管理、“官本位”和经济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的关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两者是分离的关系，还是紧密的关系？如果两者是紧密联系的关系，又是什么样的紧密关系类型？

基于波兰尼的三种经济类型、^②倪志伟等的“市场转型”理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和李培林的“社会结构转型”理论，我们假设：在“市场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出现了两种明显的发展方向：第一是“伞式社会”，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后，社会经济发展很快，但是，总体来看，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特别是干部管理体制和计划经济（即再分配经济）相比，没有太大的改变。其中，最典型的的就是沿袭了计划经济的垂直任命制，给强化“官本位”带来了体制土壤和体制条件。在中国各地经济社会转型中，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的关系依然是紧密的“庇护”与“被庇护”的伞式关系，而且，这种“伞式关系”对当地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是“蜂窝式社会”。^③

在本文中，笔者主要从“伞式社会”的视角，探讨中国“市场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关于“蜂窝型社会”，将在另外一篇论文进行探讨。

三、从“地方”和“企业”两类案例看中国的“伞式社会”

为了论证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具有的“伞式社会”特征，本文选用了“地方”和“企业”两类不同的案例作为论据。因为“地方”和“企业”两类案例都可以通过实地调查获得资料，真实可靠，是实证研究的典型论证材料。

（一）“地方”案例：兴隆华侨农场“伞式”关系下的市场转型与旅游业兴起

1980年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市场转型，对海南兴隆华侨农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兴隆华侨农场^④由计划经济的体制和管理模式转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由计划导向转为市场导向，由单一经济结构调整调整为多元经济结构，是一次值得关注的市场转型。^⑤

1. 兴隆华侨农场的市场转型：当地旅游业兴起的影响因素分析

兴隆华侨农场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国家为安置被迫迁回中国的大批归难侨设立的国有农业企业。它具有双重属性，既有国有农业企业的经济属性，又有难民安置的政治属性；它体现着中国政府签署“国际难民公约”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华侨农场的这种双重属性，决定了我们在考虑华侨农场改革与发展的问题时，必须要统筹兼顾其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两个方面。1985年，中国中央政府（26号文）决定对华侨农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⑥总体来看，本着“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宗旨，在兴隆华侨农场的各种市场化改革中，最为主要变革发生在与原有的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的农业关系较小的旅游经济，以免影响原有的产业结构和利益格局。

据我们2011年和2012年的两次实地调查，该农场的市场转型，总体上使其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实行计划经济的国有企业，变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农、工、商、旅游综合发展的华侨企业，其中，最为具有市场经济特点的是新兴的旅游业。这也是该农场最为主要的经济增长点。2003年该农场的旅游及其相关产业的产值，占农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

从地理上看，在兴隆华侨农场所在地——海南省万宁市兴隆镇的中心地带，我们可以明显地区分出两种分别代表传统经济和新兴经济的不同区域：以太阳河为界，河的西边地域是农场的传统经济地盘，包括象征农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农场总部，农场传统生活区的集贸市场、老街道和商铺、职工居住区等设施；河的东边地域是农场的新兴经济地盘，以“兴隆华侨旅游城”为主，还包括了几个附近的主要景区景点。比如，有占地6000多亩的54洞康乐园高尔夫球场；有集科

①“官本位”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经济学专用名词——“金本位”而被广泛应用。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以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评价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

②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他的名著《伟大的转折》中对人类的经济生产方式做出了三种类型的概括，即市场经济、再分配经济和互惠经济。参阅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③“蜂窝式社会”，是指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将会导致权力和特权的转移，即从再分配阶级手中转移到直接生产者（即普通老百姓）手中；平民老百姓所面临的机会、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以及对剩余产品的支配权力都会增加，老百姓就像辛勤的蜜蜂通过自己的网络关系、个人或家庭的努力编织着自己的蜂窝，私营企业、个体企业、自由职业者等不断增多。

④海南兴隆华侨农场同全国86个华侨农场一样，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创办的，带有事业性质安置归、难侨的国营华侨农场。1985年前，均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省侨务部门管理，属中央级国有华侨企业，享有县团级建制。1985年之后，成为省级国有华侨企业。

⑤笔者是海南人，20世纪80年代曾去过兴隆华侨农场，以前曾了解过一些关于这个农场的情况。为了撰写此文，对这个农场的实地调研有两次，第1次调研在2011年5月份，一起去调查的有何琳贻、郭春林；第2次调研在2012年8月份，一起去调查的有何琳贻、郭春林、郭晓菲。

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营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发〔1985〕26号，简称“中央26号文件”。

研、科普、生产、加工、观光和种植资源保护为一体的兴隆热带植物园；融自然、人文、园艺、园林与环境生态为一体的兴隆热带花园等景区景点9家。新兴起的旅游业，在一定程度上是兴隆华侨农场“对外开放”的“第二国民经济体系”。

客观上，兴隆华侨农场旅游业的崛起与当地独具良好的旅游条件有关：交通便利（地处海南东部旅游热线的中点，东线高速公路贯穿其境内）、旖旎的热带风光、盛产可供温泉浴的地热矿泉、浓香的咖啡、浓郁的侨乡风情、丰富的土地资源、曾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造访。^①同时也有形成的名气、国内日益兴旺的旅游需求、外来的投资需求等原因。

兴隆华侨农场自身的市场化改革努力也不可忽视。从1990年起，兴隆华侨农场把发展旅游经济作为振兴兴隆华侨农场的方向，建成以旅游休闲为主体、以健身康乐为内容的兴隆温泉旅游城，集温泉浴、娱乐、购物、旅游观光为一体。1993年被海南省政府列为华侨旅游度假城胜地，成为海南旅游知名品牌。目前，“兴隆华侨旅游城”里，建筑风格各异的宾馆、酒家鳞次栉比，已开业经营的有58家（其中五星级1家，四星级11家），接待床位13000多张，年接待国内外游客约300万人次，成为海南旅游的一大亮点。按业内人士的说法，到海南3天以上的旅游团，其中必有1天入住兴隆华侨农场。

2. 农场管理机构的角色转变：从“代理者”变成了“谋利者”

作为一个政企合一的国有企业，是什么动力促使兴隆华侨农场以旅游经济为主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呢？

在海南省侨务办公室和万宁市政府的“庇护”下，作为“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兴隆华侨农场以党政管理为其组织模式，用企业化的方式经营其土地、房产等资产和管理其职员，以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农场业绩和职员表现的基本标准；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不惜利用手中的权力争夺可资利用的资源；以“将政策用足，打政策的擦边球”等方式谋求更多的自由政治空间，以将变通普遍化和常规化作为一种正当的体

制运作方式为自己集团的利益服务。

从当地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经营角度看，农场管理机构以土地和温泉为的开发和经营为主。在此，我们以农场党政管理机构主导的“兴隆华侨旅游城”开发为例，说明兴隆旅游经济的发展情况。^②

“兴隆温泉迎宾馆”的前身是兴隆华侨农场招待所，最初是因为发现温泉而兴建起来的，后来成为“兴隆华侨旅游城”的发源地。这家宾馆与农场的发展历史紧密相连。为了接待国内外贵宾，兴隆华侨农场招待所于1959年建成。50多年来接待了不少中国的主要领导人，如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等，还接待了一些外国元首、大使等。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该农场利用得天独厚的旅游和温泉资源，以旅游带动各行业发展，面貌得以快速改变。20世纪90年代初，兴隆华侨农场将招待所改建成兴隆温泉迎宾馆，一部分对外开放接待游客，为一家三星级宾馆，拥有客房250多间，年接待能力18万人次；另一部分仍保留接待贵宾。比如，兴隆温泉迎宾馆的一号楼，^③是接待贵宾的地方。另外，还在附近的小湖边兴建了一个可容纳几百人同时用餐的大型水上餐厅。^④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兴隆华侨农场缺乏启动资金，开始时，以土地入股，与公安部下属的一家公司，在兴隆温泉迎宾馆的周围，共同开发了“康乐园”第一期工程。后来，又通过土地转让，得到了500万元。该农场机关干部对此议论纷纷。农场从500万中拿出400万，自己投资了“槟榔园”酒店，模仿“康乐园”的小别墅格式，盖了6幢，自己管理。后来，有一个老板出资1000万收购了“槟榔园”酒店。^⑤杜添江先生特别指出：“我们这些归侨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了解资本的使用情况。‘槟榔园’既是用来做个形象，也是用来赚钱。”

20世纪90年代初，兴隆华侨农场也缺乏管理人才，经过自营的兴隆温泉迎宾馆、向“康乐园”学习而经营的“槟榔园酒店”，农场培养出了一些酒店管理人才、财务人才；学到了一些建

① 农场成立60年来，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很多关怀与支持，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鹏、江泽民、胡锦涛等都先后莅临。

② 此部分的资料来源：2012年8月18日，对农场原副场长杜添江先生（印尼难侨子女，73岁）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之后，在杜先生陪同下，我们调查组一行4人到实地进行了考察。杜先生1989年从兴隆中学调到农场，担任副场长，主管旅游经济，1999年退休。作为农场领导之一，他曾参与“兴隆华侨旅游城”的规划编制和立项申请工作。

③ 此楼也叫“元帅楼”，为什么叫“元帅楼”呢？据说是因为当年为林彪兴建的行宫，但是，林彪没有来享用过。

④ 在20世纪90年代，水上餐厅是个高档的就餐场所，经常顾客盈门，生意兴隆，气派风光。如今却面临的拆除的命运。当我们2012年8月19日实地考察时，看到的是残垣断壁，好不荒凉。

⑤ 后来，这位老板又以1300万的价钱，将“槟榔园酒店”转让出去。我们2012年8月现场调研时，“槟榔园酒店”处于停业状态。据说，它已经停业多时。

筑设计和客房布置的知识,积累了酒店服务经验;赚到不少钱,积累了一些资金。

农场用出售“槟榔园酒店”得来的1000万资金和从温泉迎宾馆周边多家小旅馆收到的400万租金,投资兴建了另一家大型的新宾馆,叫“兴隆温泉宾馆”。最早建设的是A楼区(当地人俗称“A幢”),1992年正式建成开业,1993年迎来了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来访。此后,随着资金的累积,农场又陆续对温泉宾馆进行投资,兴建了B楼区(当地人俗称“B幢”),还有C区的20栋独立别墅。^①兴隆温泉宾馆是农场全资下属国有企业,四星级酒店,占地面积110多亩,建筑面积18887.92平方米,共拥有舒适豪华客房449余间,其中,观景房380间、豪华大套房6套、小套房13套、池畔客房50间。

“兴隆华侨旅游城”规划面积为20平方千米,已开发利用土地12平方千米。粗略来算,农场的兴隆温泉宾馆(110多亩)和兴隆温泉迎宾馆(约10亩)的用地、以及公路和公共空间等的用地,应不超过2平方千米,其余10平方千米的土地,都被农场划分为不同的地块,以出租、出让或转让等不同的方式,给50多家酒店、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和旅游景区。比如,五星级宾馆康乐园大酒店占地5.5万平方米;四星级宾馆银湖假日酒店占地面积1.1万平方米;兴隆热带花园占地400万平方米。

3. 小结

由上述各种实例可以看出,无论是地方政府(海南省侨务办公室和万宁市政府)与兴隆华侨农场的关系,还是“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兴隆华侨农场)与下属企业(如兴隆温泉迎宾馆、槟榔园酒店、兴隆温泉宾馆)的关系,都不仅是一种上级与下级的从属关系,也是一种庇护与被庇护的“伞式关系”。

根据戴慕珍和林南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在海南省侨务办公室和万宁市政府等地方政府的庇护下,作为“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兴隆华侨农场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杠杆控制和介入下属企业的经营运作:第一是企业管理。为了让地方政府(海南省侨务办公室和万宁市政府)或“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兴隆华侨农场)对下属企业更好地进行干预与控制,把企业承包或者租赁给个人而不是实行私有化。比如,20世纪90年代,兴隆温泉迎宾馆的大型水上餐厅。在水上餐厅实施

的承包制,把对农场下属企业(兴隆温泉迎宾馆)日常的经营管理权分散下放,并且用金钱激励宾馆经理提高工作效率和增加经济效益。承包者可以对水上餐厅的投资、经营、人事及发展提出建议,但是,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地方政府(海南省侨务办公室和万宁市政府)或“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兴隆华侨农场)手里。第二是资源分配。地方政府掌握着中央调拨给地方的计划内价格的物资和本地拥有的稀缺资源(如土地),进行有选择的分配。1993年,兴隆华侨农场被海南省政府列为华侨旅游度假城胜地。旅游城已开发的10平方千米土地,被划分为不同的地块,以出租、出让或转让等不同的方式,给了近60家不同的经营者(如宾馆、酒家、度假村等)。第三是行政服务。包括协助企业取得营业执照、产品合格证、产品奖和减税机会等常规服务,甚至直接给予企业行政拨款。比如,该农场协助“兴隆华侨旅游城”取得营业执照的高级酒店,五星级的有:海南兴隆海航康乐园温泉度假大酒店和兴隆老榕树温泉度假大酒店;四星级的有:兴隆金银岛温泉度假酒店、兴隆银湖温泉度假酒店、兴隆港隆大酒店、兴隆明阳山庄大酒店、兴隆明月度假大酒店、兴隆金叶桃源大酒店、兴隆南山温泉度假酒店、兴隆太阳岛度假大酒店、兴隆忆云山水温泉度假酒店、兴隆金日大酒店、兴隆鑫侨大酒店等10多家。第四是投资与贷款。控制投资和贷款决定是地方政府引导经济发展最有效的杠杆之一。比如,兴隆农场20世纪90年代对兴隆温泉迎宾馆、槟榔园酒店、兴隆温泉宾馆的A、B、C三个区等的投资和开发建设。总之,市场转型期兴隆农场之所以呈现出上述特征,主要原因在于:1. 财政压力以及农场自身的财政剩余索取权使其产生独立的利益意识;2. 事权下放过度与财权下放不足、考核强化与事权不清等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农场必须把目标转移到加快经济发展、提高财政收入、扩大社会就业、与下属企业形成类似超级企业集团的利益关系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场可以将下属企业纳入行政序列中,形成类似董事会和经营者一样的组织结构关系。概括来看,戴慕珍将这种政府与企业结合的新制度形式,称之为“地方法团主义”;^②林南将这种地方性的发展方式,称之为“地方市场社会主义”。^③

^① 经过模仿“康乐园”的别墅,自建自营“槟榔园酒店”的6幢别墅,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盖别墅经验,所以,兴隆温泉宾馆C区的20栋独立别墅,都是农场自己投资、设计和建造。

^② 参阅 Oi, Jean,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1, 1992, pp. 118~122.

^③ 参阅 Lin, Nan, “Local Market Socialism: Local Corporatism in Action in Rural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4, no. 3, 1995.

（二）“企业”案例：北京市政府与“老字号”企业的“伞式”关系

在本文中，我们用来自观察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的地方政府与企业“伞式”关系的另一类案例是，笔者2011~2014年一直关注和调研的“老字号”企业^①中的两家北京“中华老字号”企业——全聚德和同仁堂。

1. “全聚德”案例

全聚德始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至今已有140年的历史，^②跨越了3个世纪，经历了晚清衰亡、民国建立、北洋军阀统治、全民族抗战、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几个重大历史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由于长年战乱影响，全聚德的经营已经岌岌可危，当时第4代老板的夫人为了维持经营，当掉了自己的嫁妆。当时刚刚成立的北京市政府对中国的老字号品牌非常重视，认为全聚德这样知名的餐饮企业不能倒。北京市政府注入资金以后，全聚德又重新发展起来。所以，全聚德在1952年成为了第一批实现公私合营的企业，并作为具有外事接待能力的特色餐饮企业，隶属于当时的北京市服务事业管理局。公私合营拯救了濒临破产的全聚德。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把全聚德“全鸭席”选为国宴。^③周恩来总理不但对全聚德有精彩的诠释——“全而无缺，聚而不散，仁德至上”，而且还建议在前门、崇文门、宣武门一带选址建立一家全聚德分店。^④

在全聚德一系列重大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

以清晰地看到来自北京市政府的强大支持：1993年5月20日，组建成立了北京全聚德集团，整合了分布于前门、王府井、和平门的3家门店，翻开了全聚德历史的崭新一页。^⑤1994年6月，由全聚德集团等6家企业发起设立了北京全聚德烤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1月，“全聚德”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是中国第1例服务类驰名商标。2004年4月，首都旅游集团、全聚德集团、新燕莎集团实施战略重组。首都旅游集团成为北京全聚德烤鸭股份有限公司的第1大股东。2005年1月，北京全聚德烤鸭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之后的全聚德，随即收购了北京华天饮食集团30.91%股权，并列成为第一大股东，使之更名为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2007年4月，仿膳饭庄、丰泽园饭店、四川饭店等一些北京著名老字号餐饮企业，也进入全聚德，至此，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涵盖烧、烤、涮，川、鲁、宫廷、京味等多口味，汇聚京城多个餐饮老字号品牌的餐饮联合舰队。

2. “同仁堂”案例

自1952年北京市政府开始实施私营工商业改造时起，同仁堂^⑥经理乐松生开始慢慢地说服自己的家里人接受公私合营。1954年，同仁堂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带头向国家递交了公私合营申请，接受北京市政府的直接管理。^⑦由于同仁堂在公私合营运动中的积极表现，不但得到北京市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且获得了中央政府

^①参阅张继焦等《老字号蓝皮书——中国“老字号”企业发展报告 No.1（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张继焦，刘卫华《老字号绿皮书——“老字号”企业案例及发展报告 No.2（2013~201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②全聚德的创始人是河北冀县人杨全仁，以做北京烤鸭闻名，其首创的挂炉烤鸭，色香味都不次于原来的焖炉烤鸭。笔者承担了一个西城区老字号调研课题，在全聚德有关领导的陪同下，2013年11月15日到全聚德和平门店和全聚德博物馆进行了实地调查。

^③全聚德和平门店是宴请国内外政要首脑的重要场所，因此该店以“名人、名店”效应为出发点。其中，“名人苑”的设计思想以歌颂新中国三代领导人为主线，描写龙凤呈祥、群贤毕至的意境；由众多国家元首在全聚德用餐时留下的珍贵照片组成的“名人墙”以及100多个国家的大使签名留言组成的“百名大使签字墙”更是引得顾客驻足观赏；金碧辉煌的四楼“金色大厅”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和舞台灯光效果，更显名店风范。

^④当时选址选在前门老火车站东边那个地方，后来因为离市公安局太近，怕国民党特务搞破坏，才又选在和平门。主要是考虑到交通比较方便，且距离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都比较近。从地图上看，中南海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和平门全聚德三点正好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⑤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全聚德前门、王府井、和平门3家店，在北京的影响力都大大提高了，都成为国家外事接待的窗口。不过，这3家店分别隶属于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3家店为了品牌、商标的所有权，发生了争论。在这种背景下，到了1993年，北京市政府决定成立全聚德集团：把前门店从旅游局里拿出来，和平门店、王府井店从服务局拿出来，单独成立一个全聚德集团，作为政府计划单列企业直接归市政府管理，从体制上解决品牌的归属问题，解决各自为战的问题。

^⑥同仁堂（原名“同仁堂药室”，“同仁堂药铺”）创办于清康熙年间，大约在1669年前后。同仁堂的创办人姓乐，祖籍浙江宁波，早在明永乐年间就来到北京，以串铃做游方医生为业。其后世第四代乐显扬当了太医院吏目，并创办“同仁堂药室”。创始人乐显扬的三子乐凤鸣子承父业，1702年在同仁堂药室的基础上开设了“同仁堂药店”。1723年（清雍正元年）由皇帝钦定同仁堂供奉清宫御药房用药，独办188年之久官药，历经8代皇帝。本小节的有关内容，请参阅张继焦《“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看“中华老字号”企业的发展——对鹤年堂、同仁堂的比较研究》，《思想战线》2013年第3期。

^⑦1954年7月28日，同仁堂接受由11人组成的工作组入驻。那时，同仁堂成立了清产核资领导小组，起草公私合营协议书。8月27日，同仁堂公私合营大会召开，公私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这家古老的私营企业在风雨飘摇258个春秋之后，迈进了社会主义大门。对于同仁堂的工人们来说，公私合营是令人高兴的事，因为他们感觉一下子解放了。原来同仁堂有一个规矩，就是招来工人都要改名字，工人们虽然感觉受了侮辱，但是，也没有办法。合营后，工人们自己的名字恢复了，大家也都更积极地去做工了。1956年，同仁堂建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简称“工管会”，目的是对同仁堂实现企业民主管理。工管会只承担决策，而不是一个生产管理的执行机构。“工管会”的建立，进一步完善了同仁堂的管理体制。

甚至国家领导人的赏识,^①建立起了跟北京市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最高层的“庇护”关系,从一家“自负盈亏”的私营企业变成一家受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保护和大力扶持的国有企业。

在同仁堂的发展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北京市政府和中央政府强大“庇护(大力扶持)”的身影。在同仁堂的一系列重大动作中:1989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认定“同仁堂”为驰名商标,受到国家特别保护;^②1991年晋升为国家一级企业、1992年组建集团公司、^③1997年上海股市上市、^④2000年香港股市上市、^⑤2010~2011年进行企业重组和多元化发展^⑥等。

3. 小结

从全聚德和同仁堂这两家北京“中华老字号”企业的发展中,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北京市政府(有还有中央政府)大力的支持。这些支持具体表现为:政府保护其品牌、扶持其升级和壮大,政府支持其在国内和海外股票市场上市,政府鼓励和支持其规范化和多元化发展等3大个方面。

在全聚德和同仁堂两个案例中,北京市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支持都成为其资本积累和扩张最为可靠的资源,全聚德和同仁堂与政府间“庇护”关系的增强导致其企业自身的强势发展。全聚德和同仁堂作为两家成功的“老字号”企业案例不难说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为直接管理(即政府为企业“庇护人”)时,会为企业带来强大的发展动力,相应的提高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四、讨论与分析:社会结构转型下的“伞式关系”——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从上述“地方”和“企业”两类不同的案例

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影响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只是两只手:“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之间的新型“庇护”关系,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也是一种特殊的资源配置形式。

(一)从“企业”案例看“伞式关系”的资源配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通过公私合营之后,全聚德和同仁堂都从私营家族企业“摇身一变”,成为北京市政府下属的国营企业。由于全聚德和同仁堂与北京市政府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在政府主导各种资源的计划经济时代,这两家企业都成为了北京市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重点扶持企业,相应地得到了资金、厂房、技术、人员、优惠政策等多方面的关照,分别成为了所在行业(餐饮、中药)的领导企业。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逐步实行市场经济,虽然各方一直在努力改变“政企不分”的关系,表面上好像解除了一些,但是,在政府做强做大国有企业的旗帜下,由于全聚德和同仁堂与北京市政府之间的特殊上下级隶属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庇护”关系,实际上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优先获得了北京市政府上述3大方面的大力支持:保护其品牌、扶持其升级和壮大,支持其在国内和海外股票市场上市,支持其规范化和多元化发展等,可以充分享受或配置来自政府的和市场的两种资源。

(二)从“地方”案例看“伞式关系”的资源配置

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兴隆华侨农场自身以及

①比如,1955年初,彭真到同仁堂检查工作并会见了乐松生,肯定了他公私合营中的表现。接着,乐松生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同年,乐松生被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并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历任全国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又比如,1985年2月,北京市政府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同仁堂成立315周年庆祝大会。党中央、国务院对这次纪念活动十分重视,李先念、彭真、乌兰夫、王震、薄一波、郑天翔、方毅等国家领导人为同仁堂题词达30余幅。

②“同仁堂”商标还是中国第一个申请马德里国际注册的商标,大陆第一个在台湾申请注册的商标。

③1992年7月,北京市政府决定,把北京市的中药资源全部集中起来,交给同仁堂经营,建立起集团公司;7月3日,以北京药材公司、同仁堂制药厂和同仁堂药店等21个核心单位注册组成了“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8月19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集团成立大会。江泽民主席为同仁堂题词,“发扬同仁堂质量第一的优良传统,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

④1997年,国务院确定120家大型企业集团为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同仁堂作为全国唯一一家中医药企业名列其中。6月,由同仁堂集团公司6家绩优企业组建成立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年7月,同仁堂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这标志着同仁堂在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中迈出重要步伐。当时,同仁堂集团剥离出2亿元资产上市,成功筹集3亿多资金。现在,这部分资产市值已经超过200亿元。

⑤2000年5月,成立了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同仁堂科技”)。2000年10月,同仁堂科技在香港成立了同仁堂和记(香港)药业发展有限公司,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实现了国内首家A股分拆成功上市,募集资金23878.4万港元,为同仁堂产品进入国际主流市场迈出了关键一步。这是国有股分拆H股上市的第一例,被称为“同仁堂模式”。同仁堂香港上市公司,于2010年7月9日正式由香港联交所创业板转至主板上市,股票代码01666。

⑥2010年7月,由北京市政府授权的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揭牌。这标志着同仁堂实现了规范化的公司制的转变,也是体制上的一次重大变革。2011年,同仁堂下属10家子公司重组已经启动,其计划将10家子公司整合,重组后包括同仁堂股份集团、同仁堂科技集团、同仁堂国药集团、同仁堂健康药业集团、同仁堂药材(参茸)集团与同仁堂商业集团在内的6大2级集团。目前,同仁堂已经形成了在集团整体框架下发展现代制药业、零售商业和医疗服务3大板块,配套形成10大公司、2大基地、2个院、2个中心的“1032”工程,其中拥有境内、境外两家上市公司,零售门店800余家,海外合资公司(门店)28家,遍布15个国家和地区。

当地各种企业在大大小小的保护伞底下，寻求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在海南省侨务办公室和万宁市政府等地方政府的庇护伞下，兴隆华侨农场扮演着国家利益的代理人和谋求自身利益的行动者的双重角色。市场化转型和财政体制改革，使兴隆华侨农场获得了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行动空间。农场管理机构因其自身利益的出现，而具有不同于以往基层政权的特性，由此，兴隆华侨农场也从改革前的“代理型政权经营者”转变为“谋利型政权经营者”。特别是，2007年，海南省人民政府将兴隆华侨农场下放到属地的万宁市之后，该农场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谋利型政权经营者”。在此之前，该农场名义上还是“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之后，地方政府或兴隆华侨农场与有关企业也形成了多种庇护伞。比如，对下属企业是一种“父爱式庇护”（如兴隆温泉迎宾馆、兴隆温泉宾馆），对合资企业是一种“亲戚式庇护”（如海南兴隆海航康乐园），对私营企业是一种“朋友式庇护”（如兴隆银湖温泉度假酒店）。此外，地方政府或华侨农场与当地企业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庇护”与“被庇护”保护伞关系，经常被转化为地方官员或华侨农场领导与当地企业家之间“庇护”与“被庇护”的私人保护伞关系。

（三）社会结构转型下的“伞式关系”：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基于“地方”和“企业”两类案例，分析社会结构转型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配置形式（另一只看不见的手）时，有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是：“伞式社会”的基础性或结构性因素是属地管理、“官本位”和经济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由于属地管理和“官本位”的存在，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必然形成了基于“差序格局”的政府与企业间的远近亲疏“庇护”与“被庇护”的伞式关系。在这种结构性条件下，尽管中国各地发生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转型，但是，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的关系依然保持着原有的、紧密的“庇护”与“被庇护”伞式关系，而且，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市场经济过渡时期，政府和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先秩序，与政府和企业这种特殊的“伞式关系”远近亲疏关系都紧密相关。

当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阶段，中国原有的政府计划解体了，新生的市场经

济尚未成熟，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体制断裂，形成“体制洞”。^① 地方政府有必要扮演积极的角色弥补体制的缺陷。同时，由于地方政府掌握着某些特殊的资源（如土地、资金等的供应），使之具有参与经济的“本钱”。有研究指出，地方政府财税政策在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方面有明显作用。^② 这样，我们可以从市场化转型这一角度理解，为何中国的地方政府扮演了比成熟的市场经济之下的政府更多、更积极的角色。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地方政府与企业的正式关系，地方官员与企业家的私人关系，分别形成了正式的、非正式的“庇护”关系，体现为政治上很强的保护，经济上很多的关照。比如，改革初期实行“双轨价格”，地方政府掌握着部分计划价格物资的分配权，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远近亲疏“伞式”关系，使之有可能对辖下企业实行选择性的扶持。又比如，北京市政府对全聚德和同仁堂、海南地方政府对兴隆华侨农场的优惠政策支持。

五、总结

尽管中国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是市场或市场主体取决定性作用（充当“运动员”），政府主要充当“裁判员”的角色。但是，通过对“地方”和“企业”两类案例分析，我们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崛起的推动力和发展方式之一是：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转型下，企业与政府之间“伞式”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过程中，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庇护”与“被庇护”伞式关系，是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可能比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还重要。无论是海南兴隆华侨农场还是“老字号”企业全聚德和同仁堂，都是国有企业，它们都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动力之一。

在中国各地经济的发展中，尽管发生了巨大的经济结构转型，但是，政府与企业之间传统的远近亲疏的关系还在起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在属地经济和“官本位”体制下，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的关系依然是“庇护”与“被庇护”的伞式关系，在大大小小的各种庇护伞状结构下，当地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伞式社会”特点。

（责任编辑 陈 斌）

^① 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② 李翠芝，林洲钰：《政府财税扶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